

0003

1991.7.4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
历史必然性

谢忠厚 田苏苏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91年7月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谢忠厚 田苏苏

内容提要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一、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由近代中国国情和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是党领导长期武装革命斗争而取得的；是党长期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革命政权发展的结果；也是工农联盟长期的巩固和发展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性选择。

二、党的执政地位是民主党派的共同选择。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破灭之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民主党派经过几十年奋斗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三、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而且能够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任何怀疑、削弱、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

地位的企图都是没有根据的。离开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意味着全国各族人民重陷灾难。我们应当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中国共产党，维护其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伟大、正确的党。7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拥有4800万党员，正在领导11亿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不论领导革命还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伟大历史性选择，早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流血牺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即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这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页，从此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相互结合，反动势力特别强大，要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并引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是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外，其他任何阶级和政党所做不到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义和团农民革命，最终都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幻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结果，百日便告夭折。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所篡夺。在北伐战争胜利之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建立了南京政府。有些人以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了。实际上，只不过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独裁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中国人民的灾难更深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没有先进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不可能承担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为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它又是分散的小生产者，被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限制，看不到也不能实现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救中国，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不具备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梦

想。

列宁曾指出：“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①在近代中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见的阶级。它与中国近代大工业生产相联系，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方向，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代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以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并与中国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和历史使命，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很快在全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客观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此，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组织性、战斗性，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和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取得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敌强我弱、力量极其悬殊的状况下进行的，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议会民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强大的敌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长达28年的武装革命斗争，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即深入农村开辟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掌握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从陕北到海南岛的全中国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十几块根据地，到1934年，工农红军发展到30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发展到30万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无限的生命力。尔后，经过严重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联合了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国民党被动地陪伴人民走完了共同抗日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建立了19块根据地，包括1亿多人口、1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共产党壮大成为120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如果将民兵和正规军相加几乎接近国民党军队的数目。当蒋介石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以广大的解放区为基地，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歼灭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800万军队，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2000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领导长期武装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果，是以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根据地长期领导革命政权发展的结果。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建设道路，经过了从局部到全国，从地方到中央的长期奋斗过程。不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即工农民主政权，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新中国政权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雏形。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在所开辟的19个抗日根据地里，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造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运动，对各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彻底改革，建立了各级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团结了各党、各派、各界、各群众团体和名流、学者，既拥有广泛的代表性，又保证了共产党领导和基本群众在政治上占优势。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点放在村政权的改造和健全上，使那些祖祖辈辈过着悲惨生活的乡村劳苦大众第一次得到了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使党的各项政策、法令能够落实到乡村而不走样。特别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健全了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体系和一整套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同时，坚持进行“简政”和“廉政”工作，提倡发扬民主，改善领导，艰苦奋斗，改进作风，提高政权工作效率。并十分注意摆正党政关系，注意防止和克服“党权高于一切”、“党政不分”、包办代替或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反复强调党对于政权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指示和掌握，要充分发挥政权职能部门的作用和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不仅成为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锐利武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尔后在全国范围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③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工农联盟的长期巩固和发展的结果。为了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占人口80%以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广大农民群众长期过着被奴役的贫困生活，要动员他们起来投入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去，就要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为此，必须进行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经济、政治变革，实现民主政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实为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关键，也实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对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因为这种变革是同他们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国民党及其政权因此遭到了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变革特别是农村变革的问题，抗战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开展生产运动等民主民生改革，解放战争时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因此同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长期的巩固的工农联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

的革命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④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从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体验中悟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走上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以工农联盟的长期巩固和发展为基础的，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历史性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民主党派的共同选择

中国是一个多党派国家，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党制度，而不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或多党轮流执政。这是中国民主党派经历了长期磨难后的自觉选择，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民主党派发端于大革命失败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被杀害。中国共产党迅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中国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痛恨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而不赞成武装暴动的人重新集合起来，于193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被称为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纷纷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各民主党派相继成立。1944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1946年5月，九三学社成立；1947年8月，台湾民主同盟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1948年1月成立。此外，还有些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时称“社会贤达”。中国民主党派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因此，它不是单一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他们的领导骨干中还有—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的共产党人。民主党派的发展，客观上形成了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方面”势力，使其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但是，由于他们主要代表的是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压迫和束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他们的政治纲领具有反帝、反封、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民主的特点，并长期参加民主运动。这一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革命时期建立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主张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国民党则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秩序。这样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中国谋求什么前途，走什么道路的斗争。民主党派的一些上层领导人希望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采用改良的办法，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有些民主党派成立时，纲领明确提出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希望国民党蒋介石能恩赐民主。但是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却将他们这些幻想一次次碾得粉碎。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不断进行打击迫害，

或逼其流亡，或威胁利诱，甚至坐牢、枪杀。1930年至1941年初，生活书店的55个分店，有48个被查封或迫其关闭，许多店员惨遭杀害。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忍无可忍，辞去国民党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1940年，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民主人士马寅初。在血的教训面前，民主党派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逐渐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大多数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下，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这时，民主党派的有些人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均衡状态作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认为：“目前的局势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⑤，因此，再次出现了中间路线的一时活跃。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又进行了一番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个中国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完整方案，并被会议通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把“英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整套搬运到中国来”^⑥；在军事上主张由民主党派代表国家，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给他们。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协议。同时还大规模地迫害民主、进步力量。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和著名的教授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昆明。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又一次从破灭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国民党既不给人民任何自由，也不可能给民主党派以资产阶级民主。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宣告了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迫害，攻击民盟是“中共的尾巴”，是“奸盟”，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其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历史再次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决定地不允许民主党派走一条独立的中间路线的，也再次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的磨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共同的选择。与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残酷镇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一贯采取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盟被迫解散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另一方面告诫民主党派在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营垒中，并无中间路线可走。并在具体行动上热情帮助民盟迅速地在香港恢复活动，继续进行斗争。194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发展，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民主党派从亲身经历中看清了形势，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1月，在香港举行了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⑦。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⑧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态度。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进军声中，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谭平山在1948年5月写的《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中明确提出：“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⑨中国致公党声明：“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⑩中国农工民主党9月中央扩大会议还展望了今后与中共的关系，指出：“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⑪1949年1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5人联合发布《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与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⑫。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和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选择了接受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这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关于这一历史性选择，周恩来同志作过深刻的说明。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⑬民主党派几十年的奋斗经历证明：中能的民主党派，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力量薄弱，且具有软弱性和散慢性的弱点，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使他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实现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在中国，除共产党之外，再也不存在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就必须向工农革命阶级寻求支持与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主党派几十年奋斗的最终结论。

1949年9月，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领袖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各级国家政权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位，正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格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成员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一致性更加增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不是在野党、反对党，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互相支持，互相监督，共商国事。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⑭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就必须这个格局。一些人想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实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共产党相对立的反对党，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意愿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

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简言之，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通过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来保证实现的。中国解放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生产力低下，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任务是极为复杂、极为艰巨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和装备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改革那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那些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思想观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也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极其复杂、深刻的改革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地要求保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最通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才具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

新中国的42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愈益结合中，使自身更加成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伟大祖国的独立和安全。除台湾省和其它一些岛屿以外，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实现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事业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这些伟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能够感觉到触摸到的，也是世界人民公认的。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任人摆布、任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4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10年改革和建设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必须和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而且必须和能够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⑯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借口建设和改革中的某些失误，极力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妄图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得人心的，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的确，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首先应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

社会主义事业,是在经济极端落后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一项空前的创造工程,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效,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百折不挠的探索和创造精神,开拓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今世界将社会主义的伟大前程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党,能够经得住革命时期各种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同样,能够经得住建设和改革时期各种挫折和失误的考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犯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纠正了“左”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稳定、持久、协调地前进了。再次,还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虽然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它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自我批评,因为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如果它把自己腐朽的本质和压迫剥削人民的真相公诸于世,那就等于宣布了自己的垮台。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活动都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它从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有错必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特有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和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列宁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这样一个郑重的党,一个名副其实对本阶级和对全体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党。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满怀信心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寄予深切的希望。任何怀疑、削弱、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企图都是没有根据的。处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离开共产党执政,就意味着全国各族人民重陷灾难。我们应当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让我们用列宁的话共勉:“当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我们的迫切任务,我再说一遍,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社会主义的这个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②

注释: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②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③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3页。

- ④《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7—1368页。
- ⑤梁柱：《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 ⑥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 ⑦⑧《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第376页。
- ⑨⑩⑪《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第74页、第455页，第425页。
- ⑫《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505页。
- ⑬《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7—348页。
- ⑭孙西克：《谈谈政党制度问题》，《新华文摘》1990年第5期。
- ⑮《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 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53页。
- 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
- ⑱《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8页。